

刘祖武 孙官生 著



李孟北

评传

云南大学出版社

李孟北评传

刘祖武 孙官生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国树

封面、扉页设计：李昆武

版面制作：赵桂媛

李孟北评传

刘祖武 孙官生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精工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10 千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ISBN 7 - 81068 - 182 - 6/I·81

定价：（精装）26.00 元 （平装）18.00 元



1949年5月,李
孟北与妻子何伟合
影于北京。



李孟北
与妻子何伟
合影于个旧
市。



李孟北在主持会议。



李孟北深入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铜厂村看望苗族群众。



1981年10月，李孟北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边境一线了解情况。



1981年10月，李孟北同志到泸西县中枢镇看望养殖长毛兔的农户时与农户合影。



在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委书记任上的
李孟北。



1981年春节，李孟北全家在玉溪市郊外散步。

·序一·

忆 孟 北

普朝柱

翻阅《李孟北评传》一书，几十年前的往事悠然涌上心头，作为同事、兄长的李孟北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我与李孟北合作共事、相处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大有心灵相通、相见恨晚之感，播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厚情谊。

我同李孟北同志在一起工作有过两次。一次是1952年省委在玉溪搞土地改革试点，他在玉溪土改工作队下赫片当片长。当时，我刚从省委党校参加整党学习结束，地委分配我到下赫片的金家边乡当土改工作组组长。在孟北领导下共事3个月，搞了一批土改。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年底省委调孟北同志任中共玉溪地委书记，派我任玉溪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又在一起共事两年多。1982年，省委调孟北任中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我留任玉溪地委书记。1983年他在州委书记岗位上积劳病故，使我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和可尊敬的兄长。

1952年在土改工作队，孟北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文人，大笔杆，能写又能说。但他为人处事，没有一点大知识分子的架子，对同志很随和，平易近人；对群众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真心诚意通过火热的斗争实践，向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自己身体力行，教育土改队的干部也必须这样做。他对工作兢兢业业，思考周密，安排具体。记得在李家山联片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上，群众发动充分，又很讲究斗争策略，追出恶霸

地主的不少浮财。片的工作会议总结推广这些经验，各乡土改斗争进展顺利，成绩显著。

“文化大革命”中，李孟北是省里地厅干部中受迫害最早、受摧残最重的同志之一。“文革”刚刚发动，北京就制造了抓邓拓，批“三家村”的冤案，紧接着云南也炮制了以李孟北为首的“三家村”冤案，把“滇云漫谭”打成反革命文章。孟北一直被批斗看管了8年，1979年初才彻底平反纠正，恢复原职，回《云南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底孟北调玉溪地区任地委书记。我同孟北“文革”的遭遇大体相同，我是玉溪地区造反派列入要打倒斗臭的“头号走资派”，1975年才得解放；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遭劫难。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真正见到天日。我们在“文革”中受尽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但我俩谈起来，对革命理想和信念没有过丝毫的动摇，对党对毛泽东思想仍然坚定不移。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我们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79年有幸派我们到一个集体里共事，大家都非常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的机会，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为全区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发展改革开放的形势而努力拼搏。

我俩对各人的党性表现、人格力量是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互相之间无心不交，无话不谈。对地委中个别成员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及时指出，耐心帮助，促其改进，增强团结。当时的玉溪地委是一个有战斗力的领导集体。

1979年，孟北同志非常重视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从思想上拨乱反正，重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玉溪地委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地县乡三级干部会议。他亲自作动员报告、上辅导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得比较深透。他作报告从来都是自己写稿或写提纲，由于他了解情况深入，掌握政策准确，没有套话、官话和空话，道

理讲得十分透彻，极富针对性，使人听后印象深刻，又解决问题。因而为全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推进农村改革开放、发展农村经济，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孟北同志作为一个“班长”，善于团结同志，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充分发挥各人的特长优势，调动各人的积极性，放心放手地大胆工作。孟北同志是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抓意识形态的能手，大家向他学到了许多本事。我们几个长期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对农村体制改革和经济工作较熟悉，他放手让我们去抓，他不熟悉的也虚心向我们请教。当时，社会上出现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他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向群众宣传政策，讲清道理，使大家明白事实真相，从而团结大多数群众，缓和了紧张形势。待事态趋于缓和后，他放手交由这方面有特长的人员去做巩固工作，保持了社会稳定。

1981年，省委调李孟北任红河州委书记，玉溪的同志很留恋他。他在州委书记任上，积劳成疾，走得过早，大家都为党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同志，人民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干部而惋惜。《李孟北评传》一书的出版，同样寄托了我们的哀思，了却了我长期以来的一桩心愿。

2000年2月12日于昆明

我和孟北结伴行

李 原

我和孟北 30 年的友谊，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有血有泪，心领神会。直到他英年早逝，也只有伤心的沉默，尽在不言中。

我认识孟北是在 1949 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他作为北平地下党的新闻工作者和我们这些老区来的新闻工作者一起，参加《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创刊工作。那时，我做夜班，参加编辑一版要闻；孟北在采访部当记者。大家工作都很紧张，见面机会极少。

1949 年 3 月间，中央机关进城，《人民日报》也正式搬进北平出版。原来我们“北平版”的全部人马就转给了北京市委出版市委机关报。实际是恢复国共和谈破裂后被查封的《北平解放报》名称。我和孟北依然是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一个夜班，一个白班，见面机会依然不多。

我和孟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北平解放报》停刊后，一起编入在南京组建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准备到昆明创办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我俩同编在二大队一中队。到长沙后，大队人马要步行入滇，这时孟北担任中队长，我当指导员。一路行军，一路歌，我们横插湘西，穿过贵州的崇山峻岭，沐风栉雨直奔昆明。

那时，我们的成员大多是 20 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也有一

些年长的工农干部。新老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包括知识分子之间，经历、思想、风格各有千秋。这样的队伍，说好带也好带，但确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好很不容易。平时，大家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甚至争得不可开交，意见纷纭，各执一词，十分热闹。但大家情绪高涨，团结乐观，虽有争论，却彼此之间从无芥蒂。

孟北和我的性格不大相同。孟北当时才华横溢，笔头快，脑子活，思路敏捷，脸上经常带着笑容。他善于对待各种问题，处事灵活果断，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同志，遇意见不一致时，从不“硬碰硬”。而我心直口快，爱讲“死理”，遇到意见看法不一致时，我便穷追猛打，非要分出谁是谁非，有时甚至为一点小事便大动干戈。就这样，走一路，吵一路。多少年过去以后，我们再见面时，一提起当年的情形，经常是仰天大笑。彼此紧握双手，由衷地发出了“不打不成交”的感叹。

到昆明后，我们集中精力参与创办《云南日报》的工作。那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工作繁忙。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和大家特别是云南地下党的一些老新闻工作者，团结合作，同心协力，虽然工作紧张，但大家心情十分愉快。

报纸创刊伊始，在袁勃、刘希玲同志具体领导下，孟北、林钧和我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三大主任”。孟北负责采访工作，林钧负责群众工作，我主管编辑工作。不久，孟北担任了编辑主任，林钧任秘书长，我任副总编辑。当时，大家都不计较名利，只是分工合作，一心一意干好党的新闻事业。

1953年春，我和林钧先后调离《云南日报》。从此，《云南日报》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孟北、夏雨、周钟德等同志负责。但我和孟北仍时常谈工作、学习，相互砥砺。1956年，我进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回来后，下放到鹤庆任县委书记，由于众所周知的

原因，大家都忙着“放卫星、拔白旗”，日夜奔忙，却事与愿违。从此，我和孟北的联系和见面机会就少了。

1959年秋天，省委“三级干部会”传达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会议后期，决定把我调回省委，参加《创造》杂志工作。编委会的书记是于一川，副书记是林钧，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省委秘书长梁浩具体负责。我主要是协助林钧负责编辑工作。这时候，我和孟北的接触又逐渐多起来。

这时，孟北仍在报社工作，他经过磨炼，对报社的全面工作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很受领导的器重。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是围绕省委的意图，一边用以指导办好报纸，一边参与起草省委的一些文件，撰写一些由别人署名的文章。这时的孟北较之以前也有了一些变化，和梁浩等人出入相随，谈笑风生。一心一意体会领导意图，又编又写，忙得团团转，给我的感觉是多了几分热情，却少了一些冷静思考和独立见解。

1960年秋，我调省委办公厅，后兼任阎红彦同志秘书组长。这期间，红彦同志对孟北也是器重的，不仅让他参加重要会议，不断起草一些主要文件，就是下乡调查研究也经常把他带在身边，提供情况，参与意见。特别是在极“左”浪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红彦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为改变云南的落后面貌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方针、政策。他也十分重视运用报纸展开专题讨论，组织连续报道，孟北成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同时，孟北还根据红彦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为了冲破“以粮为纲”的束缚，扬长避短发展多种经营。他曾亲自三上“岩竹”山区，抓住典型，调查研究，发表连续报道，证明省委的措施符合山区实际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还组织撰写十论“杀、卖、吃”政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证明这种作法符合科学规律，群众收入增加了，干部工作好做了，干群

关系改善了。

正是由于红彦同志那种朴实、扎实、不尚空谈的思想和作风深深地感染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特别是孟北和我，在这段工作中，又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交谈了。孟北曾真诚地对我说，可不能成了让人看不起的那种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毫无主见的人啊！

孟北在他工作多年的岗位上力求做好，他勤于笔耕，善于思考。“文革”伊始，他却和夏雨、周钟德一起被无端扣上“三家村云南分店”的罪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摧残。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端正思想路线。全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帮助人们从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央采取了“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针，谁先觉醒，谁先干。孟北多次和我、增益等交换意见，相约分别多次主动献策。但却被以“中央没有文件”、“不为天下先”、“情况复杂”、“搞不清楚”、“看看再说”等理由拖了下来。不久，我到北京参加秘书长会议，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了“讨论”的内幕及全国开展讨论的情况，回来后作了汇报。很快，全国纷纷表态，讨论已是波澜壮阔，经电话请示后，云南才勉强赶上了“末班车”。云南的表态稿，也是由孟北执笔起草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是从“联产承包”突破的，云南干部群众对此欢欣鼓舞，纷纷自发行动。有人却步步为营，先是不让报纸上出现“包”字，再就是下去“灭火”。此时，我在昆明市委，孟北到了玉溪地委，我俩一起商定，关于这个问题，按实际情况和群众意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只做不说。

这期间，对孟北看似重用，有人认为还要“大用”，其实，

他心中有数。所以，他一边拼命工作，同时也开始为自己寻求退路。那时，我曾告诉孟北，你还年轻，我支持你远走高飞，以实现你的抱负。遗憾的是不久他的病情日渐严重，以至英年早逝。

他的去世，确实来得太快，太突然。长期过度劳累，加之“文革”的残酷折磨，落了个糖尿病缠身。由于他长期大量吸烟，后又猛然戒绝，加重了病情复杂变化。那次正在省委开会，因为糖尿病加重住进医院。那时，我因感冒引发肺炎也在住院。延安医院肺科余美琪主任给我检查治疗，我便请他给孟北检查一下。余主任告诉我，说他可能有其他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连续3天，余主任很认真负责，亲自抱住孟北的腰，让他大声咳嗽取出深部的痰，亲自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第3天，余主任告诉我，在孟北的痰里发现了癌细胞，小分子，低分化，是毒性最大的一种，一经发现便是晚期，不能手术治疗了，一般情况生存期不超过3个月。大家知道这个结果后都非常惊讶，一致建议送北京检查治疗。那里的老同志们会为他提供最好的安排，却希望能出现检查上的不同结论和治疗上的奇迹。

北京的同志们都非常重视孟北的病情，卫生部长崔月犁亲自安排，然而，检查的结果和云南的结论完全一样，人们最后一点良好的愿望破灭了。大家都非常着急，但又都束手无策。只有按照专家的意见，尽快把他接回云南，尽量减少他的痛苦，安排好最后的时光。回到昆明后，医院为他安排了尽可能好的护理和治疗环境。

这时，我多想和他再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更希望他在最后的时刻能告诉我点什么，其实，我想在这最后的时刻，再说什么已属多余。因为，从他那不寻常的眼神中已向我明白无误地传送了信息，我们都已越来越清醒，更深情地有会于心。真可谓此时无言胜千言。

孟北的一生，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工作，把毕生献给了他热爱的新闻事业。更宝贵的是他保留了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因此，我和大家一样深切地怀念他。

2000年3月4日
于云南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写于天津，定稿于昆明

·序三·

胸怀烈火赤子心

夏 雨

时间过得真快，孟北同志去世快 20 年了，但我总感觉到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仍和往常一样，正在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

在孟北去世 10 周年时，我曾写过一篇怀念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在‘文革’整整 10 年难以忍受的百般折磨中，想不到孟北居然顽强地活过来了；当他像一团烈火又重新炽热地燃烧起来的时候，更想不到却突然熄灭了。”

如今，翻阅了刘祖武、孙官生同志著的《李孟北评传》一书，孟北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孟北始终是一团烈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

一团烈火

凡是和孟北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他对同志对朋友的热情，对事业对工作的热情，真正是一团烈火！

只要他认为是可以交往的人、可以信赖的人，立即就把心掏给你，没有丝毫虚情假意，口是心非。他非常关心同志，宽厚待人，工作中出了差错，总是自己勇于承担责任，而保护别人，绝不争功诿过。“文革”那场风暴骤然降临之际，孟北、周钟德和我被打成所谓的“三家村”云南分店。他虽然自身难保，仍一再表示，如果有什么错误，应由他一人承担，和其他人无关。他绝